本版编辑：王翠娟
E-mail：f2@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世界新秩序需要中美合作共赢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国与美国是世界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中美关系的走向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格局。

□ 王莉丽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世界各国之间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却又相互竞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主义的方向转向，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舆论开始出现从支持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向孤立主义立场转变的趋向，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这样的历史和国际背景下，世界秩序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国际关系、理念和模式正在酝酿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国与美国是世界秩序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中美关系的走向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格局。1月20日起，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全面开启特朗普时代，以“美国优先”为核心政策理念的特朗普将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秩序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和挑战。

特朗普可能采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收缩战略”

对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执政策略、其候任期间的政治行为和政策表达，以及其内阁人选的基本组成这几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考量，特朗普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上很可能会采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收缩战略”，这将全面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亚太安全和中美关系。

从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让美国重返安全时代”“让美国人有工可作”和“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的三大治国政策框架，到他提出的“退出TPP、TTIP”、界定中国为“汇率操控国”和“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等竞选策略，大致可以勾勒出特朗普“贸易保护”的收缩策略。

特朗普的政策团队构成及政策走向。目前，特朗普的政策团队已经基本成型，外交政策方向逐渐明晰。新政府内部分裂成三股势力：“美国优先”策略的拥护者、宗教战士、传统主义者。这三股不同政策导向的势力互不信任并相互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政策制衡作用。另外，特朗普内阁成员多鹰派、多富豪班底的相互配合与执行能力仍未可知。

在解决具体政策问题时，特朗普的个人观点仍然具有绝对优势，他的个性特点和强势风格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特朗普势必要进行政策革新。他认为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上收获甚少，而这成了他谈判和交易的筹码，“经济优先”的政策理念将会是美国外交政策革命性的变化。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倾向。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更可能由经济利益而非安全或者意识形态因素所驱动。特朗普认为，平衡中美经济贸易是重中之重，他在百日新政中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华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一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导致贸易战，甚至将导致本国的经济大幅倒退，致使美国丢掉数百万的工作岗位，影响美国及其盟国（包括日韩）的经济。尽管随后特朗普团队声明会降低关税数值，却并没有彻底取消此举。

特朗普在候任期间与蔡英文的通话，直接挑战了自中美建交以来历任美国领导人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对此，中国政府郑重回应。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为首的一批重量级政策专家对特朗普的言行也进行了强烈批评并建议特朗普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特朗普正式执政后，势必要对之前的不恰当言行有所收敛，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必定会存在一系列的战略竞争。

特朗普的亚洲政策顾问们普遍属于鹰派，对中国抱有戒心，倾向于更强势的单边中美关系，这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是不利的。但是，美国官僚和利益团体政治会限制总统和新政府的过激政策。目前，美国是否会在全球治理、环境保护、疾病控制等方面继续与中国保持合作尚不确定，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应协调好利益分歧和战略竞争。

特朗普的收缩战略或引发国际秩序重构。特朗普政府可能实行的全球战略性的收缩政策，引起了全球对于美国是否会继续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怀疑。

特朗普政府可能实行的全球战略性的收缩政策，与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维护并发展的、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美国放弃这一秩序，将会引发国际动荡和国际秩序的重构。而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美国放弃其国际角色，中俄将会把握时机，重塑东亚和欧洲的力量结构。基于此，美国的政策目标很可能会避免上述危机和冲突、重塑美国的主导地位、维护国际秩序。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美国真正实施全球战略收缩的策略，导致大国竞争时代来临，管控对手、避免战争、维系自由的国际秩序将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推进对美公共外交与舆论战略的建议

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来看，第一，中美关系的实力基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主动权越来越大。这是推进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一大基础。第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的发展，双方拥有几十个战略对话、磋商机制，双方经贸往来密切，利益深度融合，中美外交要把握、顺应、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第三，美国精英舆论和普通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转换与提升的空间。据研究分析，中国精英和普通民众并未将美国视为敌人，而美国精英和普通民众也并不把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中美精英及普通民众重视合作甚于竞争，这对中美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因此，中美两国应全面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中美战略互信、避免冲突。

深入了解特朗普的个性特点与政治抱负，全方位建立沟通渠道。特朗普是一位政治素人，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概念，他反对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撤销美国一贯的外交原则，这将对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秩序和全球稳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最关心的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基础设施的改善、就业率的提高。而要实现特朗普的政策目标和政治抱负，必然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基于这一判断，特朗普即使在上任初期会实施一些过激政策，但总体上他需要与中国的深入合作。因此长远来看，中美合作空间很大。另外，为形成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中国应充分调动现有的国际资源，全方位地建立和加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核心成员联系。

理顺管理机制，推进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公共外交。新形势下的对美公共外交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专业团队建设。中国应该制定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战略规划框架，以此有序全面推进对美公共外交。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前瞻性地通过立法方式，制度化地资助公共外交项目，进行国家形象宣传、输出价值观。从国外经验看，非国家行为体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对美公共外交的行动主体中，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中国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大众传媒以及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这并不意味着削弱政府的主导地位，相反，多中心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

推动中美智库公共外交，协调危机与冲突。智库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报警器、减压器和缓冲带。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智库要加强交流与合作，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为中美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危机与冲突提供政策解决方案，发挥减压器作用。智库在中美公共外交中主要承担着三个方面的重要角色：第一，为中美全方位、多领域的公共外交合作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第二，构建全球舆论传播网络，引导舆论走向；第三，搭建高层对话平台，影响各国舆论领袖。基于智库的重要作用，智库咨询与政府决策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将对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

全力引导两国媒体，尽快形成有利于中美经济合作的舆论场。当前，基于特朗普上任后可能推出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减税、扩大基建和放松金融监管等举措，市场普遍认为中美经贸联动将会越来越强。应发动两国间的行业协会、高端智库，广泛设置经济合作议题，引导两国媒体共同形成中美经济合作的舆论氛围。可率先推动中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加强研究中美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构建有效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

加强对美国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的公共外交。2016年美国大选所反映出的美国国内政治中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的差异，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启示和新的思路。中国应确立对精英群体与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舆论影响机制。一方面，确立以智库为中心的精英舆论影响机制，加强对美智库的公共外交。另一方面，加强对美国普通公众舆论的直接影响力，并把青年群体作为影响的重点。

重视舆论调研，全面提升社交媒体传播力。2016年美国大选中，社交媒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美国公众对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超过了传统媒体。为此，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要全面提升社交媒体传播的意识和能力。我们应秉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加充分地利用好社交媒体，以强化、调动社会人际关系资源的能力，更高效率地争取民意民心、塑造国家形象。

中美关系将在博弈中继续谋求合作与发展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共经历了六位总统，这六任总统无论在竞选期间主张的对华政策如何，但执政之后都认识到对华关系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益于国内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历任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有着相同的认识。中美关系保持了长时间段的友好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持久的看法和观点。

三十多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的认知在一次次合作、竞争甚至冲突中逐渐加深。随着中美在各层次、各领域交往的不断深化，两国在新时期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将会更加全面和理智，中美的巨大合作空间更有益于全球利益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任何大型危机或对抗，需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两国相互妥协和维稳的付出。中美两国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合作共赢上。2017年伊始，中美两国需在动荡与不确定中，尽快推进各领域、各层面的对话与交流，共谋合作与发展。

战略参考

异地搬迁如何实现精准扶贫

异地搬迁这一模式要实现精准扶贫的成效，不仅要维持移民的生存条件，还要改善社会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转型，使他们融入当地社会，这需要各级政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治理经验。

□ 王晓毅

异地搬迁在中国反贫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在“十二五”期间，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下，就有1171万人通过异地搬迁改善了生活条件。在“十三五”期间，计划有近100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异地搬迁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反贫困中的制度优势。

异地搬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十三五”期间，每个迁移人口计划投入6万元以上，这需要政府具有广泛动员扶贫资源的能力；异地搬迁涉及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统一行动，特别是许多迁入地都是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扶贫任务不重，但是为了搬迁后的贫困户可以脱贫，迁入地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承担了许多搬迁成本；异地搬迁不仅要维持移民的生存条件，而且要改善他们的社会服务，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转型，融入当地社会，这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各级政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社会治理经验。

异地搬迁面临的新变化

在30多年的扶贫实践中，中国异地搬迁的模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与国家的发展和移民的需求相适应，异地搬迁的方式也在不断创新。“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关键时期，异地搬迁扶贫承担了近20%的扶贫攻坚任务，因此要认识当前异地搬迁扶贫所面临的新形势，不断完善异地搬迁的安置方式，从而更好地完成精准扶贫的任务。

迁出地的变化。迁出地包括两种，一种是完全不能进行任何生产生活的地区，如水库淹没区、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等，需要将人口完全搬迁出去，这些地方需要采取整体搬迁的措施。另一种是经过多年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地区，这类地区并非是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只是或者因为人口压力过大，导致资源紧张，生态环境退化，因此需要迁移部分人口以减轻人口压力；或者因为政策原因，比如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区；或者因为交通不便，提供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在这类地区，并不一定需要将全部人口搬迁出去，更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将所有人搬迁出去，如果采取整体搬迁方式，不仅会造成搬迁资金的浪费，还可能导致部分搬迁居民在新环境中因缺少就业机会而再次陷入贫困。

移入地的变化。在西部许多省份，移民村的建设仍然是搬迁的主要方式，在早期这种方式比较可行，因为有一些过去没有被利用的荒地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被用于安置搬迁人口。但发展到现在，可供安置移民搬迁的未开垦土地越来越少，大量安置异地搬迁居民也越来越困难，土地面积、房基地的面积都比较小，农业比较效益低，再加上移民的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通过有土安置，也就是提供住房和耕地的方式在新地方复制一个农业村庄来帮助移民脱贫，其难度越来越大。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安置移民的地区也是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大量人口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以后，有可能会导致移民区的生态退化。

吸引移民搬迁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国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大量农民以外出打工的形式离开了农村，外出打工成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的主要手段。随着劳动力外流，有些劳动力仍然在城乡之间流动，另外一些则成为城市居民。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村庄已经逐步空心化。非农就业对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有更强的吸引力。许多农民将异地搬迁与外出打工结合起来，他们希望搬迁到距离城市更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公共服务更加便捷且便于非农就业的地方。

移民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在调研中，移民的流动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很多移民并不是被安置以后就会稳定地定居下来，一些人会选择新的地方再次搬迁，也有一些人可能回到原籍。被统一安置的移民离开以后，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或者出售给没有规划的自发移民，或者空置。我们在许多移民村发现，移民村中有的房屋是空置的，有些空置是因为一些规划的移民搬走了，也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来。移民村还有一些住户是没有户籍的，因为他们并不是规划的移民，而是购买了移民的房屋来这里居住的自发移民。

创新异地搬迁扶贫模式

异地搬迁的规划需要适应移民的流动性，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建立流动的异地搬迁扶贫机制。

增加移民的生态资产补偿。在异地搬迁的政策框架下，移民得到了政府在土地、房屋、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等多方面的财政支持，这些支持的提供是基于扶贫，而非生态补偿。而移民原有的土地、宅基地和山林，这些资源大部分被转为生态用途，提供生态服务，但是其价值并没有被计算。对移民发展的支持应从扶贫转向生态补偿，在计算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提供生态补偿。生态补偿可以增加移民的经济资产，从而帮助他们在移民后更好地融入城镇的生产和生活。生态补偿可以覆盖所有移民，而扶贫只应针对移民中的贫困户。通过生态补偿盘活移民原有的资产，这对于他们移民以后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减少移民新村的建设。大量移民新村建设不仅遇到土地的瓶颈，而且耗资巨大，增收作用有限，且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容易造成生态的退化。应尽可能发挥现有村庄和城镇的作用，特别是鼓励移民进入城镇。在移民的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以社会政策为引领，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现在对于移民的扶贫和社会保障是以移民村为基础的，那些离开移民村或在移民村没有户籍的移民很难得到扶贫和社会保障。要解决现有移民政策不适应移民流动性的问题就要统筹考虑移民的社会保障和产业发展支持，建立城乡统筹和异地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考虑移民的就业稳定性差、更换工作比较频繁的特点，更需要相应的覆盖流动性较强的移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采取更加灵活的搬迁政策。对于那些难以通过外出就业增加收入的贫困人群，要通过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项目实施，或者通过土地流转增加农业就业机会，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比如，很多50岁以上的贫困人群在搬迁以后很难在非农领域就业，但是他们在家乡可以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灵活的搬迁政策可以给不同的农户提供多种选择，总的来说，采取异地搬迁的扶贫措施不能仅仅精准到村，更需要精准到户，基于不同的家庭状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在“十三五”期间，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异地扶贫搬迁模式，从而使异地搬迁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扶贫工作大局。



治理好网络社会 以阶层分析的视角

□ 王翠娟

近日，在中国社科院2016年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成果发布会上，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就中国进入网络社会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化、网络社会主体与网络治理趋势作了深入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是当前社会的重要特征。张翼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的CSS调查数据显示，作为职业分类的农民阶层已下降到28%左右，工人阶层上升到34%左右，中产阶层上升到33%左右（其中，新中产阶层占20%左右，老中产阶层占10%左右），雇主阶层占5%左右。据此，张翼认为，在后工业化的拉动之下，未来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数量和占比仍会持续增长，农民阶层还会降低，工人阶层稳定在一定规模。因此，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就从改革开放前的“两阶级加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转变为多个社会阶层。与此同时，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就使得中国当前呈现出中产化、后工业化、网络化同构的社会发展趋势。

虚拟社会的中产化程度更高。据CSS调查数据，雇主阶层与中产阶层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远远高于工人、农民阶层。如果将中产阶层分为新、老两个阶层，则新中产阶层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远高于老中产阶层。如果再将新中产阶层的供职机构分为国有与非国有，则非国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更高。据此，张翼表示，与现实社会的中产化程度相比，虚拟社会的中产化程度更高。现实社会的分层结构同样会影响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对现实社会的治理与对虚拟社会的治理不可偏废。

网络社会中新中产阶层更倾向于发表评论。张翼介绍，人们在网络社会并不仅限于购物和浏览新闻，他们还会发表评论，以自媒体方式扩大自己的话语影响力。根据CSS调查，中产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倾向于在网络发表评论，有40%左右的中产阶层会在每天或每周发表评论，非国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评论的概率高于国有单位的中产阶层。网络社会的另外一个复杂之处在于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的交织，即人们在线上活动的交流中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后，就会将线上行为转变为线下活动。在对不同阶层线上线下活动的分析中，在经常参加线下活动的人当中，也是中产阶层和雇主阶层更易于参与线下活动；非国有单位的中产阶层中，大约有40%左右的人参加过线下活动。在进入网络社会之后，网络社会的活动主体是中产阶层和雇主阶层。网络社会的评论与跟帖主要也是由中产阶层和雇主阶层所产生的，他们是网络社会主要的话语生产者。要治理好网络社会，就需要将治理的主体进一步细化，并以阶层分析的视角设计治理政策。

成果速递